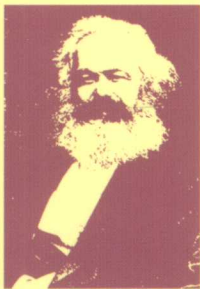




# 20世纪 西方马克思主义 哲学历程



The Journey of the Western Marxist Philosophy in the 20th Century

陈学明◎主编

**第一卷** 20世纪上半叶

三大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的先后形成与相互角逐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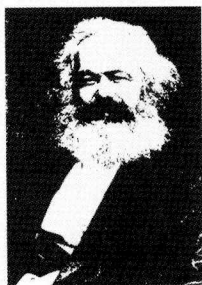
013029806

B089.1  
60  
V1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 20世纪 西方马克思主义 哲学历程



The Journey of the Western Marxist Philosophy in the 20th Century  
陈学明◎主编

**第一卷** 20世纪上半叶

三大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的先后形成与相互角逐



北航 C1635501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B089.1  
60  
V1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20 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历程. 第 1 卷, 20 世纪上半叶三大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的先后形成与相互角逐 / 陈学明主编. — 天津 :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3.2

ISBN 978 - 7 - 201 - 07873 - 1

I. ①2… II. ①陈… III. ①西方马克思主义 - 研究 - 20 世纪 IV. ①B08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308778 号

## 前 言

本书用近 200 万字的篇幅展示了 20 世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历程。在“导论”中,我们对编写本书的宗旨以及本书的内容等作了较为详尽的论述,这里仅就相关事项加以说明。

第一,本书名义上是论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在 20 世纪西方世界的发展过程,但实际上涉及的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就是说,本书主要展示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 20 世纪西方世界的发展过程,但由于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与马克思主义的其他部分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因此在论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过程时也扩展到马克思主义的其他内容。

第二,本书所说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目前国内学术界经常使用的那个概念,即不是指由卢卡奇等人开创的有特定含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这里所说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完全是地域意义上的,即泛指西方的各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思潮和流派。凡是特指由卢卡奇等人开创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我们一般都加上引号。

第三,对 20 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历程的探讨,理应是全方位的,即应涵盖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西方世界和苏联、东欧,以及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过程。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所有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本书仅限于论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过程,而把在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发展过程作为一种背景加以交代。

第四,本书分为四卷,其内容相对应的时间为 20 世纪上半叶、20 世纪下半叶(上)、20 世纪下半叶(下)、20 世纪末 21 世纪初。实际上,本书按照时间顺序把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划分为上述三个时期。这种划分带来的一个结果是,将有些流派和思潮列入特定的时间段,因而变得比较勉强。



第五,本书基本上按照流派或思潮,在其下再按照代表人物这一顺序加以论述。有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者,很难说从属于哪一种流派或思潮,另外还存在一个研究者的思想倾向与若干个流派和思潮同时相关的情况。我们这里只能大致地把他们归入某一流派或思潮。

第六,我们希望本书能够做到“史”与“论”结合,即在论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在20世纪西方世界的发展过程中,就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些理论问题提出相应的看法。然而由于本书的各位撰写者知识背景不一,所以很难完全做到这一点。有些章节基本能做到“史论结合”、“论从史出”,但还有些章节显然离这一要求相差较远。

第七,本书除“导论”作为全书的总纲外,还在每卷的前面设了“卷首语”。在“卷首语”中,我们对本卷内容与上下卷和全书之间的关系,以及本卷各章节之间的衔接都作出了交代,目的是使读者在阅读每一章节、每一卷的内容前首先有一个整体感。

第八,本书原是刘放桐、俞吾金主编的《西方哲学通史》十卷本中的一卷,后因该书对每一卷的字数有严格限制,无法容纳我们所撰写的内容,所以决定除了从所撰写的内容中抽出一部分仍然作为该书中一卷出版外,另外单独推出本书。

第九,本书之所以能以如此规模、如此速度出版,完全是天津人民出版社大力支持的结果。天津人民出版社刘晓津社长、黄沛副社长不但为本书争取并获得了国家出版基金的资助,还亲赴上海为我们鼓劲加油。天津人民出版社一编室主任王康作为本书的策划人,更是为本书的出版倾注了大量心血。

第十,虽然本书的写作前后历经数年之久,但囿于撰写者的水平和其他各种原因,总的来说,感到尚未完全达到当初设想水平,缺憾与不足之处甚多。在本书写作过程中,还参考和吸取了许多国内外同行的相关研究成果,特此致谢。

陈学明

2012年4月15日

## 导 论

人类已经告别了20世纪,在过去的所有世纪中,这一世纪是最激动人心的。20世纪所发生的绝大部分的重大事件,人类在这一世纪所走过的道路,无疑都与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相关。马克思主义哲学无论是在自身的理论上,还是在包括西方世界在内的现实生活的影响方面,在20世纪都经历了一个丰富而曲折的过程。对这一历程进行回顾与反思,是摆在全人类面前,特别是摆在马克思主义研究者面前的一项刻不容缓的使命。

显然,马克思主义哲学在20世纪西方世界的历程,与在包括苏联和东欧一批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包括正在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大步前进的中国在内的东方国家的历程有着很大的区别。因此,当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20世纪的历程加以回顾与反思之时,有必要按照地域分成三大板块展开,即马克思主义哲学在20世纪西方世界的历程、在20世纪苏联和东欧的历程、在20世纪中国的历程。基于我们目前所具有的条件和可能性,在这里先展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20世纪西方世界的历程。

尽管我们用文字描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20世纪西方世界的命运和发展过程,但却深深感到距离真正准确地把握这一历程,并相应地把其特点和理论成就揭示出来,特别是总结出经验教训还相当远。也就是说,我们实际上还没有能力做这件事。然而一种使命感驱使我们必须尝试着去做,哪怕是如此初步和肤浅。

###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在20世纪西方世界的路是如何走过来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20世纪的历程是以伯恩斯坦对马克思主义的全面修正拉开序幕的。他先是在当时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刊物《新时代》上,以《社会主义问题》为总标题,推出了一系列文章。而正是在这些文章中,他

开始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观点提出质疑。紧接着,他出版了《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全面的否定和修正。严重的是,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观点得到了第二国际内部许多人的响应。法国社会党的创始人、第二国际的领导人之一的饶勒斯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人物。作为当时第二国际主要领导人的考茨基起初对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有所批评,即主要是从方法论上加以揭露,但过了不久他就抛弃了所谓的“中派”立场,到了后期更是与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路线完全沆瀣一气。在第二国际中起来抵制和反对伯恩斯坦修正主义路线的是卢森堡。尽管她对伯恩斯坦及考茨基的修正主义路线展开了坚决的斗争,然而她的理论却始终没有在第二国际传统中占据主导地位。马克思主义哲学在20世纪头几十年西方世界的遭遇与第二国际的命运密切相关。虽然后来第二国际解散了,但由伯恩斯坦所开创的、由西方绝大多数社会民主党所继承的第二国际传统的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路向业已形成,并日益产生着重大的影响。

与此同时,另一种解释路向也在西方世界发出了强烈的声音。这就是始于俄国和苏联,而后扩展到全世界,也包括扩展到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列宁主义哲学。这样在西方世界,我们不仅看到了第二国际以及第二国际解体以后西方社会民主党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修正,也看到了西方各国共产党的理论家按照俄国和苏联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路线,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继承与发展。西方一些共产党的理论家和领袖如康福斯、福斯特、克劳斯、陶里亚第等代表了第三国际传统的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路向。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崛起,是20世纪西方世界,乃至整个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西方马克思主义”与第二国际、第三国际没有直接的思想继承关系,完全是在20世纪新的历史条件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几个早期代表人物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开创了一种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路向。全面地继承和发展这种解释路向的是法兰克福学派。“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思想在法兰克福学派那里以“社会批判理论”的形式出现。在西方世界,到了20世纪30年代以后,在哲学上代表西方马克思主义与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传统继续抗衡的,就是法兰克福学派。

我们在20世纪头几十年西方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舞台上,看到的是上述三种不同解释路向的“三足鼎立”。它们之间的争论在哲学上主要围绕着两个问题展开,第一个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究竟是不是哲学。这一争论主

要在第二国际传统的理论家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间展开。前者认定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经济理论、社会理论,而否定马克思主义是哲学;而后者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就是哲学,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力量也来自于哲学。第二个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究竟是什么。这一争论主要在第三国际传统的理论家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间展开。前者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问题还是恩格斯所说的“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其基本内容就是物质本体论、唯物主义反映论和把人类历史理解为自然史的历史观;而后者则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经过哲学革命已不再把“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作为哲学的基本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主客体统一的实践哲学,其主要特征是实践性、历史性、总体性。

这三种解释路向在哲学上的争论与分歧,是紧紧地同社会政治理论方面的争论与分歧联系在一起。它们之间在这方面的分歧点很多,但核心问题还是在如何看待当代资本主义上。围绕着如何看待当代资本主义,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第二国际传统的为当代资本主义辩护,主张对当代资本主义实施改良;第三国际传统的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一起对当代资本主义展开批判。西方共产党理论家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尽管都对资本主义社会持批判的态度,但他们的理论出发点截然不同:共产党的理论家基本上是从马克思的社会矛盾运动理论和剩余价值学说出发,来批判当代资本主义;而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则基本上是从马克思的人道主义理论和异化劳动理论出发,来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由于出发点不同,前者所展现的当代资本主义的罪恶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而后者视野中资本主义的问题则是人的全面异化,人性与社会的尖锐对立。

到了20世纪30年代以后,特别是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为二战)结束以后,这三种不同的解释路向都出现了新的走向。第二国际传统的解释路向在20世纪下半叶实际上已逐渐放弃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变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某些代表人物甚至成了西方世界最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者。当然,我们说以一些社会民主党理论家为主体的第二国际传统的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逐渐脱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轨道,并不意味着属于这一传统的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和批判,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损害而毫无益处,它们往往也从侧面或反面启示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正信奉者,迂回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西方共产党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仍然

是西方世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力量,但是他们的研究在 20 世纪下半叶发生了重大转折,这就是逐渐离开了原先第三国际的,即斯大林主义版本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体系,而走向原先一直被他们反对的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人道主义化的解释,从而在一定意义上,西方共产党的一些理论家竟然成了西方世界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欧洲共产主义”的形成,说明西方一些共产党已完全把自己的理论基础奠定在传统的人道主义之上。这样一来,以西方一些共产党理论家为主体的第三国际传统的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不要说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具有人道主义倾向的流派的界限已模糊不清,就是与第二国际传统的一些理论家的观点也已不断“趋同”。西方马克思主义中人道主义倾向的理论家,如原先的法兰克福学派,以及新形成的“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在 20 世纪下半叶更注重对马克思主义作人道主义的解释,更注重用他们所认定的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作为价值标准,衡量资本主义社会,并在此基础上对当代资本主义展开了更加激烈的批判。综观 20 世纪下半叶西方世界原先的三大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路向,我们可以看到,尽管在如何看待资本主义等一些社会政治问题上,它们之间仍然存在着尖锐的分歧,但是在哲学观点上却出现了合流的倾向,即都以自己的方式、程度不等地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人道主义,这与 20 世纪上半叶它们围绕着一系列基本哲学问题展开争论所形成的“三足鼎立”的局面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非常有意思的是,面对波澜壮阔的把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化的运动,起来抵制这一趋势并非与之抗衡的不是来自于西方共产党或者其他号称什么“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家,而是来自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新形成的把马克思主义科学主义化的思潮,如“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新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等。如果说在 20 世纪上半叶,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化的思潮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是“独占鳌头”,那么到了 20 世纪下半叶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则出现了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化的思潮和把马克思主义科学主义化的思潮“两刃相割”的局面。这些把马克思主义科学主义化的理论家,围绕着马克思主义本质特征是“批判”还是“科学”,马克思主义是“人道主义”还是“反人道主义”,真正能体现马克思主义的是马克思的早期著作还是晚期著作,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对黑格尔理论的反动还是继承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不但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的把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化的理论家,而且与整个西方世

界的各种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两股思潮之间的这些分歧反映了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在 20 世纪下半叶西方世界的分歧,而这种抗衡与对立,实际上反映了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在 20 世纪下半叶西方世界的走向。

当然,要真正把握 20 世纪下半叶西方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不能仅仅把目光停留在上述的三种解释路向上。实际上,20 世纪下半叶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出现了多样化发展的趋势,其繁荣与兴旺正是表现在这种多样化的趋势上。这种多样化的趋势首先见之于在这三种解释路向之外,又出现了许多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流派。这些新的派别仍然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只有“西方马克思学”是个例外。它的理论家仅仅把马克思主义研究作为自己的一种爱好或者职业,但他们的研究成果也确实为整个 20 世纪下半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增添了亮色。第四国际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常常被人们忽视,实际上他们那些贯穿于其政治、社会、经济理论之中的哲学观点,特别是他们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值得引起我们高度关注。流亡到西方国家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把“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成功地融入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之中,他们对 20 世纪下半叶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作出了特殊的贡献。“解放神学”则在西方世界开创了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基督教结合在一起的新倾向,一度在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界乃至整个西方学术界受到广泛重视,这绝不是偶然的。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研究引向如何实现广大第三世界国家人民的解放的问题上,他们的研究因富有时代气息和旗帜鲜明而受到普遍的尊重。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 20 世纪下半叶的西方世界呈多样化发展的趋势,其次表现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新派别。如前所述,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无论是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化上,还是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科学主义化上,都有着许多派别。除此之外,又涌现了一些以特定的领域作为研究对象的新的马克思主义派别。这同样不仅反映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而且反映了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些重要的发展趋势。“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代表了马克思主义在关于妇女解放问题上所获得的新的研究成果,在与“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和“激进主义女性主义”等当代西方“女性主义”的众多派别的斗争中,使马克思主义在妇女解放的问题上得到了更多的发言权,推进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有关妇女问题的理论观点。“生态马克思主义”则直面当代人类所面临的生态问题,力图用马克思主义



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为人类解决这一问题找到一条出路。除了这两个派别之外,在西方世界还活跃着其他一些类似的以特定领域作为研究对象的马克思主义新派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新派别往往与西方世界此起彼落的所谓“新社会运动”结合在一起。“新社会运动”中的左翼,往往都是以这些新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派别作为自己的理论支撑。

20世纪90年代,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解体和东欧一批社会主义国家的相继易帜,对西方左翼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不要说原先西方的共产党,就是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其他左翼力量,都程度不等地遭受到了挫折。在这种情况下,20世纪90年代初,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一度陷入沉寂。但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拥护者、同情者,还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对者、诋毁者,都可能未曾想到,这种“沉寂”的局面并没有维持多久。自90年代中期起,在西方世界,特别是在法、英、德、美等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掀起了一股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热潮。西方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复兴”,并不是简单地回到以往的那种研究,而是出现了许多新的趋向。这些新的趋向有:以政党为依托的研究转移为知识分子的独立研究,经院式的研究转移为密切联系实际的研究,单学科的孤立研究转换为跨学科的整体研究,争吵不休的论战式的研究转换为求同存异共同探讨式的研究。这些新特点的形成,标志着21世纪的西方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走向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一时期的西方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在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

分析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仅仅看到上述这些特点是远远不够的,这样很有可能产生一种盲目的乐观主义。实际上,在上述这些特点背后隐匿着一个更值得我们关注的倾向,那就是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态度的日益严重的分化。虽然有些研究者还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在基本认可马克思主义的前提下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但是还有些研究者,则对马克思主义作“否定性”、“批判性”的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他们那里,实际上只是个被批判的、否定的对象。当今西方绝大多数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and 一部分“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基本上属于前者,当今英、美的有些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和法国“马克思主义批评学派”的有些成员也致力于强调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性。除了这些人之外,其他的许多研究者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态度显然是主要着眼于否定和批评。且不论“后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

义哲学的“解构”多于“建构”，就拿法兰克福学派来说，这一学派在实现“政治伦理转向”进入了第三个发展阶段以后，实际上离马克思主义也越来越远了。至于当今英、美的有些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和法国“马克思主义批评学派”的某些成员，以及像鲍德里亚这样的研究者，已经很难说他们是马克思主义者了。必须指出的是，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对马克思主义的这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往往同他们的思想中有没有后现代主义的成分，以及后现代主义成分的多少相关。确实，后现代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在目前西方世界处于“此长彼消”的局面，而且随着后现代主义在西方世界影响的日益扩大，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那种“否定性”、“批判性”研究的倾向也大有占上风之势。这值得我们密切关注。

## 二、20 世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特征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 20 世纪西方世界的历程与在其他地区相比较，有着许多的自身的特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 20 世纪西方世界的历程与 19 世纪相对照，也存在着不少不同之处。归结起来主要有如下五方面：

### （一）曲折性

马克思主义哲学从诞生那天起，其性质就决定了它的发展道路是不会平坦的。这种曲折性在 20 世纪的西方世界表现得特别明显。小的波折姑且不论，大的曲折起码有三次。

第一次发生在 20 世纪初，也就是说，出现在恩格斯逝世后不久。伯恩斯坦这个曾被恩格斯指定为“遗嘱执行人”的第二国际内部最有影响的理论家，在恩格斯刚刚去世后马上以最公开和最完整的形式提出要修正马克思主义理论。伯恩斯坦自己也承认，这次他所做的并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修修补补”，而是与马克思主义“脱毛”，即从马克思主义的“禁锢”中全面地摆脱出来。伯恩斯坦的所作所为马上在第二国际内部引起了轩然大波。不要说原本是第二国际内部偏右的思想家，就是一些持中间态度的思想家都出现了相当大的思想混乱，借机对马克思主义表示怀疑、否定。像卢森堡这样起来坚决抵制的是少数。在当时的西方世界，第二国际理论家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力量，第二国际内部出现的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态度的这一变化，给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是可想而知的。

第二次出现在 20 世纪 50 年代以后,也就是在苏联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的个人迷信所产生的影响波及了西方世界以后。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所发生的这一重大变化,改变了西方世界的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力量对比,两者之间此消彼长,演化迅速。在当时的西方世界,实际上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正统”,早已由原先的承继第二国际传统的社会民主党改为承继第三国际传统的西方共产党。在西方共产党内部,在大批共产党员退党的同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兴趣以及相应的研究也迅速陷入低潮。

第三次出现在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也就是说,出现在苏联解体以及东欧一批社会主义国家易帜以后。不要以为苏联解体以及东欧一批社会主义国家的易帜对西方世界所产生的影响主要限于对西方共产党的影响,实际上,受影响的是西方整个左翼力量、整个马克思主义研究。在西方政要和右翼思想家把马克思主义送进“历史博物馆”、“埋葬”马克思主义的叫嚣声中,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很快陷入“沉寂”。马克思主义哲学在 20 世纪西方世界发展的曲折性,与整个世界,特别是西方世界政治、社会、经济发展的曲折历程是相一致的,后者的曲折性总要反映到前者中来。

## (二) 坚韧性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 20 世纪西方世界发展的这种曲折性是与其坚韧性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我们看到,马克思主义哲学每一次经历重大曲折以后,紧接着而来的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大发展。实际上,我们在 20 世纪的西方世界所看到的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蹒跚而行,而且还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波澜壮阔。马克思主义哲学在 20 世纪所遭受的打击和挑战是空前的,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打击和挑战面前,表现出了顽强的生命力。马克思主义哲学在 20 世纪的西方世界之所以能在曲折中不断地获得发展,是因为 20 世纪的西方世界有着一批抱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念,善于在逆境中生存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在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在第二国际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中,显然占支配地位的是伯恩斯坦、考茨基的修正主义路线。第二国际内的左派思想家卢森堡等,面对不可一世的伯恩斯坦、考茨基及其追随者,面对实际上与修正主义沆瀣一气的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用他们坚忍不拔的革命意志,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纯洁性,直至献出自己的生命。如果当时没有卢森堡他们与用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西方共产党理论

家的共同努力,就不可能有随之而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得以迅猛发展的局面。在20世纪西方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有着特殊地位的法兰克福学派历经几十年而不衰,也离不开这一学派的骨干所表现出来的那种百折不挠的精神。特别是在深受法西斯主义的迫害,被迫逃亡至美国的境遇中,他们还是坚持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的传统,坚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探讨。法兰克福学派后来一系列产生重大影响的名著,不少是在这一时期被推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20世纪的西方世界发展的坚韧性,在那些流亡至西方世界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身上表现得特别明显。由于在母国提出了与“官方”不相一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他们受到了非常不公正的待遇,被迫离开了自己的国家流亡至西方。即使在那样的情况下,他们并不因为受到在“马克思主义”的名义下的迫害,而动摇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相反,他们中的一些人来到西方世界以后,以更加旺盛的斗志和顽强的精神,继续追求马克思主义的“真精神”。正是他们,给整个西方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带来了新的活力。苏东剧变后,西方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经历了几年短暂的“沉寂”以后迅速“复活”,甚至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生。推动出现这一不仅出乎马克思主义的信奉者,也出乎马克思主义的反对者意料的重大的转折的,正是西方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那种坚韧的精神。这种精神我们不仅在法国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学派中可以看到,在由这一学派所组织的以1995年巴黎马克思主义大会为代表的国际会议上可以看到,而且同样可以见之于当今英国、美国、德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见之于这些研究者所举办的一系列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活动。而被誉为把今天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们所取得的理论成就显然是与他们的坚韧精神成正比的。只要仔细地阅读一下福斯特、奥康纳、佩珀等人的著作,就可以明白这一点。20世纪西方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能够在曲折中获得重大发展,显然离不开西方世界一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的坚韧性,这种坚韧性恰恰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的性质——它是真理,所以它能在逆境中生存。

### (三) 多样性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20世纪西方世界的发展,往往是通过多样性来实现的。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过程中,多元的思想发展动力取代了单一的

思想发展线索。

在恩格斯逝世以后不久,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马上滋生了多样性的局面。这不仅表现为在第二国际内部出现了左、中、右三派的对立,而且更表现为在第二国际传统之外,又产生了第三国际传统和“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从而在20世纪上半叶出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三足鼎立”之势。

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于1932年公开发表以后,围绕着对其的不同解释,更是出现了各种版本的马克思主义解释路向,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多样性趋势越来越明显。整个20世纪下半叶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最鲜明的特点,也是多样性。各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流派和思潮相继脱颖而出,“你方唱罢我登场”。除了原有的三种解释路向之外,先后产生一定影响的还有“西方马克思学”、“第四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解放神学的马克思主义”、“世界体系学派的马克思主义”、流亡至西方的原“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等等。而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则更是流派纷呈,除了法兰克福学派之外,“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新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分析派的马克思主义”、“生态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等先后呈现在人们面前。而且,“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的各种派别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之外的各种思潮交织在一起。

苏东剧变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西方世界的“复兴”,也是以多样性为主要标志的。各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思潮,无论是以弘扬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宗旨,还是主要着眼于批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都显得异常的活跃,共同构成了20世纪末21世纪初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繁荣图景。“后马克思主义”的出现并产生重大影响则表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多样性已发展到了很高的程度。

实践证明,仅仅用“分化”甚至“分裂”这样的词汇来描述和理解这种多样性是十分不妥当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多样性,给马克思主义哲学带来的积极意义远大于消极性,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获得发展的一个重要前提,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西方世界的繁荣,正是借助于这种多样性来取得的。仔细观察西方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这种多样性的前后变化,我们还可看到在苏东剧变前,处于多样性态势下的各种马克思主义研究派别,往往为了争得一个“正统”的地位相互之间展开激烈的斗争,从而出现了马克思主义研究派别之间水火不相容的局面,这种对立往往超过马克思

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对立程度。苏东剧变后,各种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派别尽管仍然存在着尖锐的分歧,但是已逐渐开始相互包容,不再为了某一个观点而展开你死我活的斗争,而是能平心静气地坐在一起进行求同存异的讨论。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者终于认可了这种多样性的合理性与合法性。20世纪西方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这种多样性局面的出现,反映了随着时间的推移,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那里的哲学观点原本所具有的歧义性会越来越不可避免地显现出来,更反映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会因理解者的立场、处境的不同,而必然会出现差异。

#### (四) 开放性

整个20世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历程,都是一个“开放”的过程。这里所说的“开放”,指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者强调马克思主义应向各种思潮开放,从而吸收各种非马克思主义中的宝贵因素。除了在20世纪上半叶继承第三国际传统的西方共产党思想家,往往以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党性原则”为理由,致力于划清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界限,强调前者对后者的批判之外,其他各种马克思主义研究派别和思潮,一般都程度不等地用非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长”来补马克思主义哲学之“短”。实际上,即使是西方共产党的理论家,其中也有不少人到了20世纪的下半叶,一改与非马克思主义哲学势不两立的态度,在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非马克思主义哲学“融合”方面,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当然,在20世纪西方的各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流派与思潮中,数“西方马克思主义”“开放”的色彩最浓。“西方马克思主义”本来就是以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非马克思主义哲学结合在一起为主要特征的。从属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是一些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某一特定的哲学思潮“融合”在一起的派别,例如“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新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分析派的马克思主义”等。我们看到20世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往往是借助于与其他西方哲学思潮的结合而实现的。

在20世纪西方世界的哲学舞台上,出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哲学思潮相互交融、相互渗透的画面。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在致力于吸收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宝贵因素的过程中,首先是重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同较早的欧洲权威的哲学体系联系起来,退回到马克思以前的哲学



舞台去。他们试图通过这一途径,即直接从欧洲哲学权威出发,沿着青年马克思的轨道,重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体系。当然,他们更多的是试图把一些现代西方哲学思想“补充”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去。可以说,他们广泛涉及现代西方的各种哲学流派,只要一出现有影响的新的哲学思潮,他们就会将其纳入自己的理论视野,寻找可以用来修正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闪光点”。

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热衷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开放”,是与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基本认识密切相关。在他们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其创始人那里就是一个“开放”的体系,马克思和恩格斯倘若不吸收他们以前的以及与他们同时代的哲学思想,就不可能创立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而历史发展到今天,马克思主义哲学要继续发展保持旺盛的生命力,仍然必须保持自己的“开放性”,即仍然必须从一切优秀的哲学思想中吸收养分。

### (五) 现实性

20世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过程,是不断地与现实相结合的过程。20世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能对20世纪西方的历史进程产生重大影响,主要在于其具有“现实性”这一重大特征。尽管有“西方马克思学”这样的纯粹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纯学术进行研究的派别,但是总的来说,20世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绝大多数派别都注重面对社会现实。

且不说第二国际、第三国际、第四国际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都力图以自己的立场和观点直接对现实问题作出回答,就以曾被称为“经院马克思主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而言,尽管他们同西方国家的工人运动几乎没有任何直接的联系,尽管他们从来也没有企图建立某种政党来实践自己的学说,尽管他们大多是关在书斋里钻研学问的学者、教授,尽管他们写下的著作非常晦涩难懂,但是从他们所关注的一些理论问题来看,他们实际上也并没有回避现实的挑战。他们那深奥难懂的语言中,负载着大量关于急剧变化着的资本主义世界的信息,跳动着这个特定时代的脉搏,也倾注了他们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命运的深刻关注。可以说,他们实际上是在书斋里,用他们特定的语言和方式曲折地反映着他们生活的那个时代。综观整个20世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过程,就可以清楚地知